通識研究集刊 第九期

2006年06月 頁67~90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商隱〈錦瑟〉詩繫年考*

余金龍**

摘要

晚唐詩人李商隱(八一二~八五八)〈錦瑟〉詩，綜觀迄今之論述，最主要的有，對令狐綯之自傷說，令狐楚青衣說，還有就是悼亡說。然而各家之說，只是更加憑添其朦朧性及多義性。

本論亦採悼亡說為主，首先，先探討是否為王茂元之女所作，但是有關「無端五十絃」之含意，又與王茂元之女的事蹟，有許多不合。所以本論主張李商隱原配夫人，於開成元年(八三六)逝世說，而詩之繫年，也認為很可能是大中二年(八四八)，李商隱自桂林北返長安途經藍田時，有感而發、追憶其原配夫人所作之詩。

關鍵字：錦瑟、二十五歲、開成元年、原配夫人、大中二年、悼亡。

* 本文於 2006 年 6 月 5 日在開南大學「2006 年大學基礎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經修正後刊登

** 開南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The Research of When Lee Shang-Ying wrote the poem “The Inlaid Lute”

Chin-Lung Yu

Abstract

Li Shang Ying (812-858 BC) is the poet of the late Tong Dynasty. About the issue of his poem “The Inlaid Lute”, there are lots of aspects. One of them said it’s the self-compassion of Lee Shang-Ying to Ling Who-Tao; another said it’s to write for Ling Who-Chu’s concubine; the other said it’s to mourn the death. However, the diversity of these issues only makes the obscure and variation of this poem.

We favor the aspect of mourning the death. The first, we investigated if it was to mourn the daughter of Wang Mao-Yuan. However, there 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erse “How come the inlaid lute has fifty strings?” and the life story of Wang Mao-Yuan’s daughter. So, we maintain that it was to mourn Lee Shang-Ying’s first wife, who died of Kai-Chun Year 1 of the Tong Dynasty (836). As for when Lee Shang-Ying wrote this poem, he possibly did it on Da-Chung Year 2 (848).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e time when Lee Shang-Ying passed by Lan-Tien while going back from Gwe-Lin to Chang-An. He felt something and wrote it down to recall his first wife.

Key words: inlaid lute, twenty five years old, Kai-Chun Year 1, first wife, Da-Chung Year 2, mourning the death

李商隱〈錦瑟〉詩繫年考

余金龍

壹、前言

晚唐詩人李商隱（八一二～八五八）〈錦瑟〉詩：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¹

這首〈錦瑟〉詩，前人之解釋，很不一致。宋人有音樂說，見《湘素雜記》，清人何焯、汪師韓等人，持自傷說，而馮浩、朱彝尊等人，則持悼亡說。²綜觀迄今之論述，在此加以歸納分類有：詠物、悼亡、憂國、令狐青衣、自比文才、政治詩，及音樂說等等。然而各家之說，只是更加憑添其朦朧性及多義性。黃世中〈《錦瑟》箋釋述評及悼亡新箋〉亦言：

李商隱〈錦瑟〉詩，解人最多，也聚訟最繁。從北宋劉攽到清末民初的張爾田，解〈錦瑟〉者近七十家，一百多條評箋。³

本論，亦採悼亡說為主。首先，先探討是否為王茂元之女所作。但是有關「無端五十絃」之含意，又與王茂元之女的事蹟，有許多不合。故在此特別提出，從李商隱與原配夫人之間的另一視角，來對其〈錦瑟〉詩，做一可能性的問題探討與詮釋。

¹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年。第493頁。

²梁樞〈《錦瑟》新論〉，《李商隱研究論集》。王蒙、劉學鍇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400頁。

³黃世中，〈《錦瑟》箋釋述評及悼亡新箋〉。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1989年1月。第128頁。

貳、本 論

一、王茂元之女說：

(一) 王氏結婚與死亡時間

本詩出現之線索，只有二個，一是時間的數字「五十」，另一是地點「藍田」，有關地點之論述，容後再述，在此先行探討「五十」之含意。

孟心史所言，李商隱與王女結婚於二十五歲，所以有「無端五十絃」之說。⁴但是，李商隱究竟於何時結婚？結婚時又是幾歲？王女又是於何時去世？去世時又是幾歲？可在此做一瞭解。

開成二年（八三七）李商隱中舉，禮部放榜為二月二十四日，李商隱於開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由長安返回濟源。傅璇琮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

我們從李商隱的作品可以考知「關試」的具體日子〈上令狐相公狀五〉：「今月二十四日禮部放榜，某僥幸成名。」李商隱是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進士登第的。〈上令狐相公狀六〉又云：前月七日過關試迄，伏以經年滯留，自春宴集，雖懷歸苦無其長道，而適遠方俟於聚糧，即以今月二十七日東下。……由上述三條材料貫串起來看，則當時正月二十四日放榜，二月七日過關試，三月二十七日離京東下。⁵

李商隱又於中秋左右，接獲令狐楚在興元病危之消息，自濟源趕赴興元。令狐楚於開成二年十一月病亡後，李商隱自興元護棺至京兆府。

由以上可知，開成二年間，李商隱似不可能赴王茂元涇原幕與王女結婚。但是，開成三年（八三八），如果李商隱赴涇原幕與王女結婚，再應關試不取後，回涇原幕，則與當時之時間往返上又不相符。所以近人劉學鍇、余恕誠，在《李商隱詩歌集解》中：

三年，應宏博試，目的既在釋褐入仕，試前自當閉戶研習，以求必勝，……則

⁴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432頁。

⁵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8月。第502、503頁。

較合情理。……是則應宏博試當在春初，入涇幕當在春暮。成婚則又入幕之後也。⁶

說明開成三年關試前，李商隱並未與王茂元之女王氏結婚，而是其庇護者令狐楚亡後，令狐絢守父喪期間，李商隱在開成三年宏詞試落第後，接受王茂元之招攬，前赴涇原幕後，才與王女結婚。按開成三年李商隱，時當二十七歲，亦與「無端五十絃」之「二十五」不合，而且結婚是喜事，怎有「無端」斷絃之事？

正如近人王達津舉出，李商隱之〈錦瑟〉詩中的「錦瑟無端五十絃」，爲了證明「五十」，強說李商隱生年於元和六年（八一—），而卒於咸通三年（八六二）、或四年（八六三），故李商隱死時，已五十一、二，正與「五十絃」相符。⁷此正是「以詩證譜」之錯誤。

另外，汪辟疆亦舉出李商隱之〈錦瑟〉詩中的「錦瑟無端五十絃」，爲了證明「五十」而言：

余嘗疑義山當生於元和四年卒於大中十三年，得年五十有一，然則此詩即姑定為五十初度之作，亦無不可。其以錦瑟標題而不云五十初度者，蓋必詩意甚明，不如取首二字為聳括一切也。⁸

以此推論並加以繫年的論述，不甚合理，畢竟此詩之作成年代不清楚，怎可強言〈錦瑟〉詩是於五十歲左右之作品？而且李商隱是死於四十七歲，大中十二年（八五八）春，至少數字上不合。

換言之，如果王妻死於二十五歲時，即大中五年（八五一），往前推算至開成三年，王女結婚時，則爲十二歲。但劉學鍇、余恕誠認爲本詩非悼亡詩：

⁶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2095頁。

⁷王達津，《唐詩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第202頁。

⁸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18頁。

錦瑟若為亡妻之象徵，則「五十絃」當指王氏亡故之約略年歲。然大中五年義山年方四十（依張說），王氏其時必不可能年近五旬（王氏係義山續娶，年當小於義山），孟心史謂義山與王氏結褵時各二十五，朱彝尊謂王氏二十五歲而歿，均非（依朱說，則王氏結婚時年方十二）。此悼亡說之必不可通者一。⁹

按《唐史索隱》所言：

唐代部分女子嫁時年齡統計表：據此表看來出嫁最早的十一歲，最遲的二十四歲。人數最多的是十四歲、十五歲的各為五人，其次多的是十三歲、十七歲、十八歲，各佔四人。十三歲以下，十九歲以上的則佔少數了。……總之十四歲、十五歲結婚的最多，十三歲到十八歲結婚的佔次多數。¹⁰

所以按此計算，王女結婚才十二歲，雖不合法理，一般為十三歲。但情理上，如果王女是十二歲嫁給李商隱，亦有可能。又，如果王女結婚時為二十五歲，則又超出唐代女子結婚之年紀，也與「無端五十絃」之斷絃之意不合。所以本詩迄今之解釋，最有可能逼近事實之說法，即是，朱彝尊所言：

此悼亡詩也。……瑟本二十五弦，一斷而為五十絃矣，故曰「無端」也，取斷絃之意也。「一絃一柱」而接「思華年」三字，意其人年二十五而歿也。¹¹

但是，男性優位的社會，應是男性幾歲時喪妻，很少說出妻死之年紀，才是合理。李商隱對王氏亡妻之悼亡詩，寫的非常直接，基本上，也沒有寫出其妻，死亡時之年紀。例如本詩之「莊生」、「望帝」，也是以男性作譬，描述男性之世界。

如果王女死時，僅二十五歲，而此詩繫年於大中五年時，則與「追憶」、「當時」之時間表現，便太過緊迫了。也與同時期之悼亡詩作品（見下節），以平鋪直述，描寫

⁹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435頁。

¹⁰李樹桐，《唐史索隱》。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月。第242頁。

¹¹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424頁。

日常性感受之詩風，截然不同。

如繫年爲大中五年之後¹²，到李商隱逝世之前時，按李商隱大中五年，妻死後即前往梓幕，幕罷後返回長安爲大中十年（八五六），大中十二年死於鄭州，病重的李商隱，在現有資料上也沒有記載，此間有前往藍田縣之跡，亦與「藍田」、「滄海」之句，不是那般貼切。

如果說是大中五年入蜀後，見景（錦瑟）思情之說，¹³或音樂之說，¹⁴而唐代琴、瑟等樂器，幾乎與文人息息相關。若按此，李商隱在蜀幕近五年，幾乎每天均可見琴、瑟之彈奏，何苦屢煩描述記載，此說倒是有所牽強也。

（二）悼亡詩

大中五年，李商隱及其妻王女之行跡，張爾田之考證較馮浩之推測合理，並認爲：

大中五年春，盧弘止卒於鎮，徐州府罷，復以文章干綯，補太學博士。妻王氏卒。¹⁵

又，張爾田認爲：

（大中五年）義山徐州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補太學博士，妻王氏卒，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書記。十月得見，改判上軍，旋檢校工部郎中，冬，差赴西川推獄。案馮氏年譜之謬，莫甚於以王氏之卒繫諸五年，而以蜀辟繫之六年也。¹⁶

¹²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年。第493頁。「馮浩認爲是大中五年入蜀以後所作。」

¹³徐復觀著，《中國文學論集》。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3月。第248頁。「可知錦瑟之作，乃義山在東川時，睹物（錦瑟）思人，引起了青年時期的深刻回憶，在此回憶中，把婚姻問題，知遇問題凝結成爲一片感傷的情緒，因而寫出來的。」

¹⁴梁樞《〈錦瑟〉新論》。王蒙、劉學鍇，《李商隱研究論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400頁。

¹⁵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135、157、167、170、171頁。

¹⁶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171頁。

大中五年春，盧弘止死於徐州幕，李商隱亦於當時返回長安。大中四年（八五〇）十月時，令狐綯已貴為宰相。所以大中五年春，返回長安之李商隱，依賴令狐綯謀職，補為太學博士。不久，恰巧鎮河南之柳仲郢出使梓州刺史，令狐綯又從中介紹，李商隱才入其梓州幕。

李商隱後於大中七年（八五三）十一月十日所撰〈樊南乙集序〉中亦言：

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¹⁷

上算三年，即大中五年其妻死。又大中五年七月，河南尹柳仲郢移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李商隱在其〈樊南乙集序〉中言：

（大中五年）七月，尚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¹⁸

說明其妻王女是在李商隱七月間奏為「記室」之後，才病故的。見〈房中曲〉詩：

憶得前年春，末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愁到天地翻，相見不相識。¹⁹

應是李商隱任太學博士時，回至家中，妻已亡故，無法見到最後一面，令人哀愁。

又，〈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詩，知其連襟姻親韓瞻，為慰藉李商隱喪妻之痛，請其小酌，但李商隱因悼亡日近而婉拒：

謝傅門庭舊未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更無人所簾垂地，欲拂塵時篋竟床。

¹⁷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430頁。

¹⁸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430頁。

¹⁹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172頁。

嵇氏幼男猶可憫，左家嬌女豈能忘。秋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²⁰

隨後連襟韓瞻，在李商隱赴梓幕時，送至長安西北渭城，李商隱亦在渭水邊題詩答謝韓瞻：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佳兆聯翩遇鳳凰，雕文羽帳紫金床。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
烏鵲失棲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陽見夕陽。²¹

在其赴梓幕途次，即陝西省寶雞縣西南，俗稱「蜀道難」之大散關時，遇雪題詩〈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詩：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與鴛鴦。²²

又李商隱於大中五年十月，懷者喪妻之痛，前赴梓州，幕主柳仲郢，體念孤獨孑然之李商隱，並將隨身之歌伎一人送給李商隱，照顧其起居生活。〈上河東公啓〉亦言：

商隱啟：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睹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
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
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旬娘之啟，
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²³

李商隱予以婉拒，後於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所撰〈樊南乙集序〉中亦言：

²⁰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年8月。第455頁。「秋霖、西風正表其妻死為秋季。」
可參見拙論〈李商隱《西亭》、《夜冷》與《臨發崇讓紫薇》詩之著作年代考〉。開南管理學院《運籌》4
期。2004年2月。第1-30頁。

²¹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年8月。第461頁。

²²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年8月。第463頁。

²³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34頁。

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刻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²⁴

即李商隱喪妻二年後的大中七年，決定入佛參道，皈依佛門，此間亦是李商隱人生一重大之轉捩點，所以李商隱才有自行編輯文集《樊南文集（乙）》之行爲。²⁵

另外，馮浩、劉學鍇、余恕誠認為李商隱〈夜冷〉、〈西亭〉、〈臨發崇讓宅紫薇〉詩等，為李商隱喪妻後，前往於洛陽，並在王茂元崇讓宅，觸景傷情，所作之詩。然而上述之詩作，可能是李商隱於會昌三年（八四三）九月時，王茂元亡故時，李商隱奔喪洛陽時所做。²⁶

由以上可知，王氏亡故，李商隱的悼亡詩，則以「直述法」，描述其對王妻之感傷，平鋪直述的描寫其悼亡之心情，「愁到天地翻，相見不相識。」是如此之真情流露。

所以，〈錦瑟〉詩，按其內容應屬「隱抑法」，而且於最重要之時間前後，例如大中五年，或之後直到大中十二年李商隱病亡之際，有關「無端五十弦」，均無較合理數字之解釋。如果說見景思情，「藍田日暖玉生煙」，也應是前往藍田之地，但此間李商隱，也無前往藍田之跡。

二、原配夫人說：

（一）原配去世時間

迄今之論述，均未注意到李商隱原配夫人之存在。但是，李商隱又是何時與其原配夫人結婚，則不可考，其原配有關之記載，亦非詳細。僅有李商隱的〈祭小姪女寄寄文〉中：

堂前階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況吾別娶

²⁴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430頁。

²⁵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此間李商隱因糖尿病，身體逐漸惡化，已開始戒酒、入佛。」

²⁶拙論，〈李商隱《西亭》、《夜冷》與《臨發崇讓紫薇》詩之著作年代考〉。開南管理學院《運籌》4期。2004年2月。第1-30頁。「王女已嫁李商隱，洛陽崇陽宅為王茂元宅，王氏死後，如要葬，也葬在長安樊南，或日後改葬鄭州故居之地，不可能葬在洛陽王氏娘家，而且張爾田亦言此間無暇往返洛陽或鄭州之地。」

以來，胤緒未立。²⁷（底線筆著）

上文為會昌三年所寫。²⁸由「別娶」可知，李商隱的「元配夫人」，並非是王茂元之女，在此亦可得到證實，王茂元之女是李商隱的續絃妻。但是李商隱何時與原配結婚，現存的資料已無法查證。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

考商隱弟義叟之女夭於開成五年，時年四歲，則當生於開成二年，其結婚當不晚於開成元年。按舊時兄弟婚娶慣例，兄娶應在前，由此可推知商隱初婚應在開成元年之前。如開成三年娶王氏女為初婚，則不符合常規。²⁹

如按《唐史索隱》所言：

貞觀元年詔令指示的婚姻年齡是男子二十女子十五以上，到開元二十二年敕令又改早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其中原因，雖未說明，據理推測，當係貞觀至開元年間，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常有結婚的，政府為遷就事實而重訂法的。³⁰

男子結婚約在十五歲，按李商隱如在寶曆二年（八二六）十五歲結婚時，其原配則可能亦是十三至十五歲之間，估不論此。但其原配死亡時間，至少在開成三年，李商隱與王茂元之女結婚之前，即已去世。查看李商隱文集，其原配最有可能去世之時間，為開成元年。開成元年，李商隱春試落第後，曾稍於長安停留，並與令狐楚相見，李商隱在長安稍做停留後，並接受令狐楚的經濟支援。見〈上令狐相公四〉中：

伏奉月日榮是兼及前件綃等，退省孱庸，久塵恩煦，致之華館，待以嘉賓，德

²⁷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340頁。

²⁸拙著，《李商隱傳新論》。台北，合慶國際圖書公司。2002年10月。第22頁。

²⁹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全五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3月。第833頁。

³⁰李樹桐，《唐史索隱》。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月。242頁。

異顏回，簞瓢不稱於亞聖。行非劉實，薪水每累於主人，束帛是將，千里而遠，緼袍十載，方見於改為，大雪丈餘，免虞於偃臥。³¹

受到令狐楚之禮遇及援助後，又有〈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所得四十一韻〉之詩作，³²及落第後〈別令狐綯拾遺書〉之文³³，應當與李肱、令狐綯等也曾相見，隨後返回濟源。惟此時令狐綯已官拜左拾遺，而李商隱仍是落第寒門之書生。

又開成元年，李商隱春試落第後，四月正值令狐楚異動。史載為：

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³⁴

令狐楚招請李商隱前赴興元幕，但此時李商隱並未前往其幕，見〈上令狐相公狀三〉：

劉公一紙，遽有望於招延，雖自以數奇，亦未謂道廢，下情無任佩德感激之至，彼州風物極佳，節候又早，遠聞漢水，已有梅花。³⁵

李商隱未赴興元幕之原因，據上文之「自以數奇」之內容而言，很可能於此際適逢其「元配夫人」之喪。綜觀李商隱之生涯，唯有此間，有原配之喪的可能，故而未能前赴興元幕。在此推論其原配可能於開成元年三、四月左右病亡。而且，若非是有重大事件，有知遇之恩的令狐楚，邀請李商隱前往其幕，李商隱一定會前往的。正如開成二年，令狐楚於興元病危時，李商隱聞訊即兼程趕往興元幕。

李商隱於開成二年進士及第後，〈上令狐相公狀六〉中：

³¹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52頁。

³²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年8月。第64頁。

³³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437-440頁。

³⁴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2月。第4464頁。

³⁵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51頁。

前月七日，過關試訖，……即以今月二十七日東下，伏思自依門館，行將十年。³⁶

衣錦還鄉的李商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卻收到令狐楚病重之噩耗，遂赴興元幕。約莫於中秋時節，自濟源趕赴至興元。〈上令狐相公狀六〉中：

至中秋方遂專往，起居未間，瞻望旌旄，如闕天地。³⁷

在〈奠相國令狐公文〉中回憶：

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臨絕丁寧，託爾而存。³⁸

李商隱趕赴興元幕時，令狐楚請李商隱代為草擬〈為彭陽公興元請尋醫表〉及〈代彭陽公遺表〉後亡故。〈令狐楚傳〉記：

開成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冊贈司空，諡曰文。³⁹

當然令狐楚的死，對李商隱而言，是無以言比的打擊，因為在此十年間，從受知於令狐楚至進士及第後，令狐楚之死為止，對李商隱具有深遠的影響。見〈奠相國令狐公文〉中：

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⁴⁰

³⁶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53、654頁。

³⁷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55頁。

³⁸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309頁。

³⁹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2月。第4464頁。

⁴⁰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309頁。

乃是真情流露之心。另外〈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詩中亦言：

延陵留表墓，峴首送沈碑。敢伐不加點，猶當無愧辭。
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後，川原亦幾移。⁴¹

在感念令狐楚知遇之恩下，李商隱護送庇護者令狐楚之棺木返回長安。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韻〉中，亦提及「蛇年建丑月，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北濟渭之濱」。即開成二年，自興元返長安途中之「西郊」（鳳翔府）一帶，雖經甘露之變二年後，仍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眼見此景，心中之痛，油然而生，此長篇詩作，直指唐末社會之亂象：

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面啼，無衣可迎賓。……………又聞理與亂，繫人不繫天。⁴²

李商隱在此詩中，客觀的反應歷史現狀，當然也是一針見血的言及整個政治的混亂，「繫人不繫天」，不在自然之侵害，而是人爲之災禍。表面上雖暗指當時宦官之禍，導致農民身在之水深火熱中。側面上亦可看出李商隱此時內心之變化，可說明李商隱此時，因喪妻又加上恩人令狐楚之亡故，產生對時事不滿之心情，在此表漏無遺。

另一方面，又正逢開成元年，春試的落第，也相對擴大其對時事之不滿。特別是在開成元年時，令狐楚之子令狐綯，從弘文館校書郎高升至左拾遺之官位。反觀李商隱仍是落第寒門書生，心中油然而生之不滿及自卑，亦充分表現在其〈別令狐綯拾遺書〉：

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故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螻蟻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燃量其欲，牙齒

⁴¹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112頁。

⁴²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96、98頁。

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故不能不同於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見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彼女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幼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⁴³

正如「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即對女性地位之不平等所做的申訴。如果此時正是李商隱之原配夫人病危之際，告別友人後，返回濟源，在此亦可瞭解其心情。當然對其內心深處而言，也是另一種深刻的打擊。

李商隱開成元年所作之〈東還〉詩：「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長夢採華芝。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嵩陽尋舊師。」很可能就是開成元年三、四月，原配妻於濟源喪後，於秋葬於故鄉鄭州後之心情，所以才有「秋風動地黃雲暮」之句，也在此特別提出此觀點作為補證。⁴⁴

開成二年初，春試前的〈上崔華州書〉亦言：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之耳。」已是有行道不繫今古，有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同，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⁴⁵

可謂是離經叛道，大表不滿之言論。在此也說明，李商隱在京師十年寒窗的求仕途中，不幸之事接二連三的降臨其身，親人之亡故、失落、流離、落第。最後，恩人令狐楚，又在開成二年，李商隱進士及第後亡故。

⁴³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437~440頁。

⁴⁴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39頁。請參見拙論，〈李商隱《東還》詩〉。《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第九期）。2001年7月。第201-216頁。「李商隱開成元年，夏返濟源，秋有往來濟源、鄭州之跡。原論為秋返濟源，在此補正。原論僅談及是落第之心情，在此亦有可能是喪妻之心情。」

⁴⁵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441頁。

以上可知，李商隱與令狐家之關係如此密切，於開成元年，未能前往興元幕，擔任令狐楚之幕僚，一定是家中突然發生變故，所以「無端五十絃」之「無端」或可解作「突然、無故」、「好端端的」原配妻病亡。也因多情之詩人，觸景生情、觸物而悲，本是緣情之鬱積，反覺物是有意引恨，故不禁怨之，故曰「無端」。其一生的坎坷不運，在此，亦可逐漸的明瞭其絃外之音。

綜觀以上瞭解，李商隱於開成元年，二十五歲時，原配夫人病逝，所以才有「無端五十弦」，說明李商隱二十五歲時妻亡。（如果更有可能李商隱原配夫人與李商隱同年，若同是十五歲結婚時，本詩「無端五十絃」之意境，豈非達到最高潮之效果，因目前尚無較確切之證據，在此暫不討論。）如本詩是開成元年，原配妻病亡所寫，則又與正七句「追憶」，正八句「當時」不合。

在此也瞭解，如果是祭文，則將寫出亡妻之年紀。如「夫人兵部第三女，年十七歸於安陽君。」〈請盧尚書撰曾祖妣誌文狀〉⁴⁶「年有十八，歸於河東裴允元。」〈請盧尚書撰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誌文狀〉⁴⁷，畢竟李商隱都為小姪女「寄寄」寫祭文，亦知其年紀。但是悼亡詩，是以男性為中心論述，應是李商隱本身之年紀，於幾歲時喪妻，及本身之心情，而不是描寫女性之心情與年紀。正如〈上令狐相公狀三〉「雖自以數奇，亦未謂道廢。」⁴⁸為一對長輩之「狀」文，當然也就不會明白道出「喪妻」之事情。以致今日現存李商隱文集中，其原配夫人之姓氏、年紀，均未曾出現過，這也是李商隱身世的另一個謎案。本論僅在此就其可能性之一，作為一問題之提出，拋磚引玉。

（二）繫年考

但是，本詩，又是何時所寫呢？基本上，是不易考定。但是在此姑且做一試論，以現有之證據，作為依據，探討本詩之繫年。

本詩出現另一個線索，是地點「藍田」，如果說見景思情，「藍田日暖玉生煙」，也應是前往藍田之地。但李商隱生平中有經過前往藍田之跡，僅有大中二年（八四八），桂林幕罷，自桂林北返長安途經藍田之跡。

⁴⁶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860-861頁。

⁴⁷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862頁。

⁴⁸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51頁。

按李商隱〈為滎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文知：

去年五月十五日發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門，……其年十二月六日，差綱某等，
……今年五月八日至烏雷。……又遭颶風，……其月十八日，至崑崙灘。……
去年六月已後，至今年六月已前，從發赴安南。⁴⁹

至少上文可證明李商隱於大中二年六月尚在桂州。又如下文：

以今月二十三日南去，家無甚累。〈為滎陽公與前浙東楊大夫啟〉⁵⁰

伏料旌旆，將及容州，……即以某月日進發到任。〈為滎陽公與容州韋中丞狀〉
51

某以九月九日到任上訖，映帶谿洞。〈為滎陽公與魏中丞狀〉⁵²

即「今月二十三日南去」，至少是六月以後，如照「九月九日到任上訖」而言，應是大中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桂林出發，九月九日抵循州。如李商隱於大中二年九月九日以後，未隨鄭亞赴循州，如何能知鄭亞於九月九日抵循州，又為鄭亞寫上〈為滎陽公與魏中丞狀〉乙文。

按此可知，李商隱送鄭亞至循州後，即走陸路返長安，而非洛陽。約於大中二年冬，抵長安。故有〈四皓廟〉（本為留侯慕赤松）、〈四皓廟〉（羽翼殊勳棄若遺）、〈五松驛〉、〈商於新開路〉、〈陸發荆南始至商洛詩〉，商洛即長安南面之商縣。⁵³

岑仲勉亦言：

⁴⁹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533、534頁。

⁵⁰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736頁。

⁵¹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29頁。

⁵²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29頁。

⁵³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270、131、57、81、332頁。

考《通典一七五·商州》：「上洛，漢舊縣，有秦嶺山。」《史記·封禪書正義》引《括地志》：「……在雍州藍田縣。」是望秦嶺及五松驛在赴襄鄧路中，居長安東南，張顧採朱說以為東還所經，里地，考史，兩俱失之。⁵⁴

所以，本詩很可能是李商隱大中二年北返長安，途經藍田時，望景所作。朱鶴齡注說明：《長安志》：「藍田山，在長安縣東南三十里。其山產玉，亦名玉山。」⁵⁵杜甫《去矣行》詩：「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⁵⁶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等多首有關藍田、藍溪之作，⁵⁷就是指此藍田之地。

「滄海」和「月」、「珠」的關係密切，李商隱《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只將滄海月，長慶赤城霞。」⁵⁸《送臻師》「今來滄海欲求珠。」⁵⁹馮浩亦言：「桂之東南，廣州、循州而外，皆大海也。」《桂林》詩⁶⁰。大中三年（八四九）李商隱自我介紹之《上尚書范陽公啓》文中，言及「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⁶¹即可佐證李商隱於大中二年自「桂海」返京。是李商隱在桂林送鄭亞前往貶所循州時之親身體驗，正是此「滄海」之地也。朱鶴齡亦言：

《文選注》：「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闕。」郭憲《別國洞冥記》：「味勒國在日南，……得淚珠，則鮫人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⁶²

「滄海」即「日南」之地也。「滄海」和「月」和「珠」的關係，又很密切，「月」、「珠」

⁵⁴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台灣，中華書局，1984。第228頁。「但岑氏所言李商隱前往桂林採陸路說，拙論不表贊同，應是水路，而北返時才是走陸路的。請參見拙著《李商隱傳新論》。台北，合慶國際圖書公司，2002年10月。第127頁。」

⁵⁵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422頁。

⁵⁶杜甫《去矣行》。彭定求等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第2265頁。

⁵⁷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彭定求等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第4789頁。

⁵⁸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519頁。

⁵⁹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584頁。

⁶⁰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281頁。

⁶¹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15、216頁。

⁶²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422頁。

互喻，然後，將南海中鮫人，泣淚為珠的情形，融入本詩。於是月珠、明珠、淚珠，三者合一，幾於難辨，於是產生「滄海月明珠有淚」這一名句。

又，「滄海月明珠有淚」之句在前，「藍田日暖玉生煙」句在後，亦說明時間經過之次序，是先「滄海」之地，再行返回長安而途經「藍田」之所時，望景生情所作之詩。

本詩首聯既明言錦瑟，即為亡妻之象徵，則「五十絃」當指，李商隱二十五歲時「斷弦」。又以「思華年」總領，以「一絃一柱」與「思華年」相連結，實已明示係追憶華年往事，已逝之悲，不勝回憶之作。所以此詩寫作時，已事隔十二年之久（開成元年至大中二年），相當於一紀之久，「思念」之情，有如「一年一思」，「一絃一柱」，寓意其中。另外，其他有關對原配思念之詩，很可能就是以〈無題〉詩等連續作品，以「無題」的「隱抑法」來表現其思念之情。⁶³

另首，〈房中曲〉「錦瑟長於人」一語，對王氏之悼亡詩，可說明李商隱對其妻王氏之思念是「長在我心」的。相對的，對原配之思念，是一種模糊的印象與追憶，是一種回歸先祖的意念心情，所以才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紀昀亦言：

問長孺解錦瑟如何？曰詳詩末二句，是感懷舊人之作，此說是也。⁶⁴

「莊生」句，係生者思念之情，如夢似幻，令人迷惘，用意在「夢」字。而此種境界，亦即以象徵夢見亡妻之幻影，如夢似幻，惘然令人迷戀。惟有迷曉夢於蝴蝶，死者魂魄才能有所歸宿。以莊生夢蝶之典，所取生者為其變幻迷亂，而望死者有所輪迴轉生。莊生即蝴蝶，蝴蝶即莊生。夢醒時刻，化蝶無蹤，羽化成仙，了無痕跡。

「望帝」句，係寫生者之淒迷哀怨，如啼鵲泣血，不如歸去，著意處在「杜鵑」（不如歸去）字。而「春心」為：

本指愛情之嚮往追求，常用以喻指對理想之追求。然語即本楚辭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故又兼有「傷春」之意。義山詩中「傷春」一詞，多指傷時憂

⁶³拙論，〈李商隱《無題》詩考〉。《李商隱研讀》（開南管理學院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2004年3月。第64頁。

⁶⁴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430頁。

國、感傷身世，所謂「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曲江〉、「刻意傷春復傷別」〈杜司勳〉、「地下傷春亦白頭」〈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君問傷春句，千辭不可刪」〈朱槿花〉、「年華無一事，只是自傷春」〈清河〉皆可參證。⁶⁵

然則「望帝」句，謂己之壯志雄心及傷時憂國、感傷身世之情，均託之哀怨凄斷之詩歌，如望帝之化鶉般，以自嘆哀怨，諸行無常，不如歸去也。杜鶉，即作者之詩心。

正如開成元年秋之〈東還〉詩作。⁶⁶描述喪妻當時之心情，亦頗有不如歸去之嘆。就在當年原配之死，李商隱之作品一定留在手邊，或還記得詩之內容。又李商隱於開成二年，為文宗皇帝之欽點進士，而開成五年（八四〇）〈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⁶⁷正是對開成文宗皇帝之哀悼與思念，在此亦是有如望帝之化杜鶉，已如隔世矣。自桂海途經藍田後，眼前將是闊別二年之久的長安，還要再為仕途奔波嗎？

大中二年初，鄭亞、李德裕也因「吳湘事件」受到左遷。如：

此獄是鄭亞首倡，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鞠，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皆竄逐。《舊唐書》⁶⁸

就「吳湘事件」而言，正是朝廷「詔下御史臺鞠按」⁶⁹，下令追查「吳湘事件」後續情形。在開始調查鄭亞之罪行時，李商隱奉鄭亞之命，自桂州出使江陵，去瞭解或解釋事件之經過。但最後仍見鄭亞、李德裕被貶循州、珠崖，輪迴轉生，諸行無常，不如歸去吧！此間亦是李商隱人生一重大之轉捩點，所以李商隱才有自行編輯文集《樊南文集（甲）》之行爲。⁷⁰

⁶⁵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437頁。

⁶⁶拙論，〈李商隱《東還》詩〉。《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第九期）。2001年7月。第201-216頁。

⁶⁷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台北，里仁書局，1989。第538頁。「拙論〈李商隱《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考〉，主張是開成五年正月文宗帝崩時所作。」（見開南管理學院、元智大學及萬能科技大學聯合主辦第二屆「國家治理、公民社會與通識教育研討會」2004年6月24日。第1-33頁。

⁶⁸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2月。第4501頁。

⁶⁹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2月。第618頁。

⁷⁰李商隱著，馮浩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此間因南行遇水災、政治異變等，為其生命之轉捩點，才有自編文集之行爲。」

「滄海之珠」句，比喻亡妻為稀世珍寶，為人所追求，今則獨在明月映照之黃泉路下，空成鮫人所垂之「珠淚」。「藍田之玉」句，似寫亡妻之身影，縹緲朦朧，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望之若有似無，近看知其無又若有，屬虛無縹緲之域。有如「本來無一物，明鏡亦非台」之「空與無」的境界。李商隱將抽象化之感情，化之以具體化之「滄海之珠」、「藍田之玉」，來表現、描寫一位遙遠的已故的原配妻子。但是又「隱忍」的以虛無縹緲的「淚（水）」、「煙」來表白，因為還需顧忌，在世的續絃妻王氏。在此也似乎也逐漸逼近李商隱的〈錦瑟〉詩的絃外之音及其他〈無題〉詩之創作原意。

大中二年，自佛教深化的桂林返回長安後，李商隱的詩，受到桂林氣息濃厚的佛教影響後，佛教思想也開始轉變成深度化的文學的意境，據羅香林〈唐代桂林磨崖佛像考〉言：

廣西桂林西山一帶，其唐代佛教造像，亦足與西北各區相並論者。……自昔之交通孔道言之，必多數曾經過桂林。其風教必有被及，則桂林佛教之盛，所從來久矣。……道光重修湘山寺（廣西全縣）志卷上云：「大和九年，沙汰僧尼，會昌五年，廢殘佛像，焚毀藏經，甚之極矣。師無恙。……丙寅春，唐宣宗即位，有詔復興釋教，湘源之父老子弟，此時已苦旱三年矣。……大中二年春，……始歸淨土院，……每日召徒眾講無量壽經」。⁷¹

換言之，桂林原本即是佛教隆盛之地，加之宣宗恢復推廣佛教，李商隱於此地再與淨土宗接近。澤崎久和〈李商隱晚年佛教信仰與駢文作家活動〉一文中指出：

李商隱佛教信仰，……法華經信仰的持續及其詳細情形不明下，三十代後半所見其淨土教的祈拜情形來看。加之，晚年所事師之知玄，也是淨土教徒等事實。

⁷²

⁷¹羅香林著、〈唐代桂林磨崖佛像考〉。《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書店。1992年12月。73、81、111、112頁。

⁷²澤崎久和著、〈李商隱晚年佛教信仰與駢文作家活動〉。《東洋學》42輯。東北大學出版。1979年10月。289頁。（拙譯）

事實說明，李商隱赴桂林府湘山寺之淨土院參拜，其影響亦不可忽視。受淨土宗影響，其部分詩中，亦可窺其大略。如〈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詩：

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⁷³

據其自注：時余在惠祥上人講下，故崔落句有「梵王宮地羅含宅，賴許時時聽法來。」句中「上人」稱呼，即是淨土教徒之稱謂也。⁷⁴

李商隱的〈錦瑟〉詩，在此亦可自佛教的禪意中，導引出其詩境來，而許多詩象，不可單純以悼亡詩等看過而已。此詩亦可借晚唐司空圖的〈與極浦書〉來說明一、二。如：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⁷⁵

此「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即與禪學有關。在此之前，對本詩許多之箋注，亦未曾指出與佛教有深層之關係。據此，佛教經典的語句，具有新的語意，注入李商隱的詩句中，所帶來新意象，在佛教徒李商隱的思想概念上，亦產生豐富且多元性的意境，當然對中國的文學及思想是帶來相當大的影響，故而在明末清初的錢謙益為釋道源的〈李義山詩集序〉：

義山無題諸什，春女讀之而哀，秋士讀之而悲，公真清淨僧，何取乎爾也？公曰：佛言眾生為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燒燃則不乾，愛流不飄鼓則不息。詩至於義山，慧極而流，思深而蕩，流旋蕩復，塵影落謝，則情瀾障而慾薪燼矣。春蠶到死，蠟燭灰乾，香銷夢斷，霜降水涸，斯亦篋蛇樹猴之善喻也。

⁷³馮浩著、《王澐生詩集箋注》。里仁書局。民國78年8月15日臺三版。619頁。

⁷⁴馮浩著、《王澐生詩集箋注》。里仁書局。民國78年8月15日臺三版。620頁。

⁷⁵張中行著、《佛教與中國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38頁。亦見《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762頁。

且夫螢火暮鴉，隋宮水調之餘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籌筆儲胥，感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英雄陽炎，由是可以影事山河，長挹三界，疑神奏苦集之音，阿徒證那含之果。⁷⁶

亦可說明「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在李商隱內心世界及其詩之意境中，「情」世界的「空與無」，可由佛教的觀點來加以註釋，原本只是悼亡的詩句，成為後代多義性的詩句，更增添其具有佛教經典深邃的意境。所以，本論在此特別提出，以另一視角，以〈錦瑟〉詩為出發，並以大中二年為繫年，在李商隱的生涯中，一重要的轉捩點，對李商隱與原配夫人之間的關係，做一初步問題探討與詮釋。

⁷⁶朱鶴齡箋著、程孟星刪補、《李義山詩集箋注》。廣文書局。民國70年8月再版。（《牧齋有學集》卷15）。第126頁。

參、結 論

李商隱的生涯中，只有大中二年，有途經藍田縣之跡，而且大中二年九月，鄭亞自桂管地被貶至循州時，李商隱未被貶至循州，僅是送鄭亞到循州，後再行返回長安。途中於長安東南的藍田縣，目睹藍田玉生煙得景象，見景生情，由情生文，但又考慮到續絃妻王氏尚在人間，不得不以曖昧的方式表達對原配夫人的悼亡。

但因為此悼亡詩已是追憶之詩文，寫於大中二年，距離其原配夫人死於開成元年，李商隱二十五歲時，已過十二年之久。所以〈錦瑟〉詩，表現的並不像大中五年，李商隱續絃妻王氏死時之悼亡詩，如「歸來已不見」〈房中曲〉日常性般的平鋪直述。還有就是李商隱之作品一定留在手邊，或還記得詩之內容。所以李商隱續絃妻王氏死時之詩作，未見有〈錦瑟〉詩之詩題，僅有〈房中曲〉「錦瑟長於人」，以作區隔，而詩內容「直述法」之表現，也有所不同。

在此也瞭解，如果是祭文，將寫出亡妻之年紀，如小姪女「寄寄」、仲姊裴氏及曾祖母，祭文中亦知其年歲。但是悼亡詩，正如前述般，一般是以男性為中心論述，應是李商隱本身之年紀幾歲時，遭逢喪妻及本身之心情，而不是描寫女性之心情與年紀。而且在現存李商隱文集中，其原配夫人之姓氏、年紀，未曾出現過，如一團謎霧，正如〈無題〉詩般。

李商隱的詩，自桂林返回長安後，佛教思想的轉變較深度化，文學的意境也逐漸擴大化，所以原本只是悼亡的詩句，演繹成為後代多義性的詩句，更增添其詩意的經典深邃的意境。而且，大中二年，為李商隱的生涯中，一重要的轉捩點，李商隱與原配夫人之間的關係，迄今均為後世所遺忘。本論主張〈錦瑟〉詩，為李商隱原配夫人說，而其繫年，也認為很可能是大中二年，李商隱自桂林北返長安途經藍田時，有感而發、追憶其原配夫人所作之詩。

從以上得知，李商隱這時期的行蹤及作品，以往並未受到太多注意，而它們的意義，卻不僅只是作為詩人的單一過程或某一類詩歌作品而已，對於考察李商隱作品及文學內容的流變，似乎也具有特殊意義，並應加以重新的思考與評價，這正是本文的宗旨所在。